

刘 少 奇 的 故 事 之 四

全八册

# 刘 少 奇 的 故 事

● 王玉强 月 涛 著

之四



中共党史出版社

# 刘少奇的故事

(之 四)

王玉强 月 涛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

# 目 录

---

|               |    |
|---------------|----|
| 抬棺游行之后 .....  | 1  |
| 处变不惊 .....    | 11 |
| 一针见血的医生 ..... | 22 |
| 身先士卒 .....    | 33 |
| 一定要抓枪杆子 ..... | 40 |
| 冀东暴动 .....    | 53 |
| 骨肉情深 .....    | 66 |

## 抬棺游行之后

---

1936年初春的天津，虽说有了一些春意，但这里尚有积雪的天气依然很冷。

刘少奇一行经过3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踏上了北方海滨城市天津。这是他第二次来天津。很快，他们就到了预定的日租界兴安路北洋饭店住下。

几天后，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手拿一卷报纸来到刘少奇居住的门前，看了看门牌号，轻轻敲了几下。这时，刘少奇正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待着地下党组织派人来接头。听到敲门声，他急忙开门迎客。

“您是胡先生吗？”来客问道。

“是的。”刘少奇一面回答，一面瞟了一眼来客手上的报纸。从露出来的报头可以看到，这是一张《益世报》。

“我是李先生介绍来的。”来客自我介绍。

刘少奇点点头，把客人让进房间。客人又把带来的《益世报》放在桌子上。这时，两人都会意地笑了起来。他们立即把房门关上，秘密交谈起来。

他们按照事先规定好的暗语暗号，接上了关系。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来客是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王林。

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天津，白色恐怖严重，共产党活动非常困难。党的负责人只能通过秘密电台和地下交通员单线联系。随时有坐牢杀头和组织被破坏的危险。

刘少奇一到天津便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急于了解情况，先后让王林两次来到饭店汇报工作。每次王林汇报时，总是打消不了心中的问号。以前从没有听说过胡服这个名字，这位新来的中央代表究竟是谁呢？言谈中，刘少奇似乎看出了这一点。为了让王林放心，在第二次谈话结束后，他用手指在桌子上写了“刘少奇”三个字。王林一看十分惊喜地站起来：“你就是刘少奇？这太好了，你来了，我们北方的党组织有希望了。”

住大饭店固然是好，但人多且杂，很不安全。因此，刘少奇在北洋饭店只住了三天，便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的协助下，租赁了黑龙江路隆泰里十九号楼上

的房间居住。这幢小楼位于日、法租界的交界处，靠近海河广场吊桥，周围街道纵横，四通八达，既适于隐蔽，又便于转移。楼下就是房东王惠开的“惠兴德”成衣铺，收有一个徒弟叫郭大，专门承做各种中式便服。当时，王惠曾亲手给刘少奇做过一身便服，郭大还曾经给刘少奇打过开水，但从不过问刘少奇的来历，只知道他是准备到一家大学教书的“教授”，眼下正在家中养病。

刘少奇名义上在养病，实际上密切关注着外面形势的发展。一天，当刘少奇从天津《大公报》上看到《北平学生抬棺游行，警队弹压略有冲突》的报道后，陷入了沉思。他觉察到，参加游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他深为感情用事的学生痛惜；同时也感到“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太深。于是他开始对北平抬棺游行事件进行处理。

事情的起因要从这年春天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谈起。随着日军向京津地区侵略的深入，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抗日爱国热情逐步高涨。国民党为了讨好日本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便颁布了这一法令，规定当局可以解散抗日救亡团体，可以逮捕甚至枪杀爱国分子。按照这一法令，仅北平一地，就有二百多名爱国青年被捕入狱。

年仅十八岁的北平高级中学学生郭清就是这二百多名中的一位。入狱后他遭到反动派严刑拷打和折磨，惨死在狱中。临死前，郭清面对打手毫不屈服，坚定地说：“我决不怕死，因为我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是中国人，我必须救中国。”

不久，郭清惨死的消息传到北平各学校，学生们对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愤怒了。有的学生说：“我们不是绵羊，我们不能任人宰割。我们中的一个被敌人杀了，我们要争取掉泪的机会，我们要表示复仇的决心！”学生运动中“左”的急躁情绪有所抬头。于是，北平市学生联合党团决定于3月31日在北京大学三院为郭清举行追悼大会。这时的中共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对白色恐怖形势的严重估计不足，遂同意了这个计划。

3月31日那天，北平天色阴沉。强烈的西北风在街道上狂暴地吹着，门窗发出刺耳的尖啸。上千名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早早地来到北京大学。追悼会场上摆放着许多吊唁的花圈和挽联。平津学联送来一条白色横幅，上写“郭清今日不死，为民族而奋斗，虽死犹生！”的醒目大字。一位东北籍学生从棺材铺弄来的棺材，放在礼堂中央，棺材前挂着郭清的遗像，会场庄严肃穆。

追悼大会开始以后，先由学生联合会主席致辞，再

由学生代表宣读祭文。这时会场的气氛更加沉痛，表达爱国学生心情的祭文在礼堂里回荡。

“我们要把血淋淋的事实大声告诉全世界，我们要清算这一笔血帐。”

“我们只有沉痛的愤恨，像火一样烈，海一样深的愤怒和仇恨……”

突然间，一名学生跑进来，大喊一声：“警察来了，警察把大院封锁了。”

学生们听到这一消息更加愤怒了。有人高喊：“为了追悼郭清和巩固我们的精神，我们要抬棺游行！”这一建议马上得到大家的响应，参加追悼会的学生争先恐后地抬起棺材，冲到大街上游行。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游行队伍来到南池子附近时，突然遭到大批军警的袭击，游行的学生被打散，四十多名学生被捕，一百多名学生被打伤。

抬棺游行事件，虽然显示了北平爱国青年崇高的救亡激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但是，这次行动也暴露了革命骨干力量，使一些敌人费尽心机拿着黑名单也抓不到的学生干部被捕了，其中有北平市学联负责人黄华、北大学生会负责人谢云晖、清华大学党支部负责人赵德尊等。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巫省三、吴沛

仓和叶纪霖等四人被校方开除。从此，北大学生会被迫停止活动，青年学生爱国救亡运动陷入严重困境。

这一事件，是继 1935 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受到的又一次严重打击。刘少奇认为，这一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瓦窑堡会议提出的建立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就会落空。他决定抓住这个典型事件，对党员和干部从思想上进行一次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的教育。

于是，刘少奇立即给北平的有关同志写了题为《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的一封信，刊登在内部刊物《火线》第 55 期上。署名为“K·V·”。

在信中，他分析了形势，指出了这次行动的错误与危害。他说：“正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当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在这时，鼓励少数先进分子，向敌人做冒险的进攻，结果就会招致敌人更残酷与更野蛮的进攻，使自己陷于更加孤立的地位，使建立统一战线的事业受到损害。”针对抬棺游行，他指出：“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

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使汉奸法西斯蒂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室杀爱国运动。最后只剩下你们几个布尔什维克在秘密的房子内去‘抗日救国’。这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这是怎样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这不简单是错，而是罪恶啊!”

信中还指出：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是有长久历史的”，所以，这种错误“不是你们负责的”。事实上，大批学生运动的骨干都是新党员，他们不了解过去的“左”倾错误造成白区许多同志流血牺牲的惨痛教训。

他还耐心地对北平的同志说：“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更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不应采取今天这样的方式。可以设置灵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送挽。如果要开追悼会，可以与学校当局商议，可以请学校当局教授讲演，也可以举行比较盛大的葬仪，就是说完全公开地进行纪念。如果遇到某些事不能得到允许（如开会，盛大葬仪等），就少做一件两件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样作，我们相信会得到成功，不会失败。”

多年来，华北地区地下党的同志在党的刊物上看过不少鼓吹斗争和暴动的文章，这封信一扫过去那种

充满火药味的论调，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有的党员在打听这个署名 K·V·的人是什么人？

从此，中共北平市委吸取抬棺游行事件的教训，根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做了许多善后工作。如把平津学联改组为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学联改名为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宣言，检讨过去学联的错误，提出要以新的姿态和新的路线来指导学生运动，“把一切的同学们都组织起来”。后来，在这些华北救亡团体的努力下，全国学生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刘少奇认为，上海有党的改组基础，城市大，又有租界，便于掩护，便于联系华中、华南。

为了把抗日爱国运动持久坚持下去，他们号召各校同学复课，提出了“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进一步健全和巩固学生自治会组织，设法营救被捕的进步教授和同学；同时要求各校充分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形式和机会，关心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从各种学生的不同觉悟程度、不同兴趣爱好的实际状况出发，对广大学生进行艰苦深入的团结、教育和组织工作。他们一方面批判胡适等人“读书救国”的谬论，引导那些关门读书不问政治的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为

此，在燕京大学成立了公开社团“北平求知学会”，各校成立了分会，会员有一千多人。他们还联络其他学术团体，经常组织“新哲学讲座”等演讲活动，出版《求知月刊》，向广大学生宣讲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知识和抗日救亡的道理。北平师范大学组织了“科学战争研究会”，把读书、科学探讨和抗日救亡工作结合起来。清华大学成立了“实用科学会”等团体。这些社团组织的活动，吸引了许多平常不大关心政治，但对科学有兴趣的学生参加，使他们在学术活动中受到了教育。另一方面他们教育进步学生，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也要认真学习好功课，取得优异成绩，并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

在党的领导下，各校进步学生还根据广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成立文艺团体，创办文艺刊物。燕京大学有“十二九”文艺社，清华大学有“清华文学会”，中国大学有“文艺茶会”等等，并利用假期组织同学到西山去野营。一时间，歌咏活动普及各大中学校，《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救亡歌曲唱遍了城市和乡村。学生们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使许多学生受到了集体主义的教育。

同时，学联又要求学生们主动团结教师。北平学联

发表了争取“师生合作”的文件，检讨过去处理师生关系不当的地方，诚恳请求爱国师长给予帮助、教育和支持。不久，北京各校六十六名著名教授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书》，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抗日。学联马上发动签名运动，支持教授的行动，使学生与教师联合起来。

在北方局和刘少奇的领导下，曾遭到反动当局破坏的北方党组织相继得到恢复，华北各界的救国联合会相继成立，天津地区出现了各界联合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 处 变 不 惊

---

“号外！号外！”

“西安发生重大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被扣押！”

1936年12月13日清晨，报童稚嫩、尖利的叫卖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惊动了天津市英租界广东路福荫里一号的女主人。她赶忙扔下手里的活计，把钱放在篮子里吊下去，急不可待地取出报纸翻看。

“快来看！老棉，张学良、杨虎城把老蒋给扣住了！”女主人郭明秋向刚刚走进家门的丈夫林枫说。

林枫一把抓过那张报纸，匆匆看了一眼，“这可是件大事，我得赶快去找老戴去！”

“老戴”就是刘少奇，他受中央委派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领导着白区党的工作。由于日军逼迫得紧，蒋介石不让国民党军队抗战，却一门心思“剿共”，

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激起了替他背黑锅、放弃东三省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的愤慨。张、杨二人在红军到达陕北后，一方面受蒋介石胁迫令“剿共”，实力被不断削弱，终于发现“剿共”不是出路，转而同中国共产党达成秘密协议，互不干涉，同时“逼蒋抗日”；另一方面，张学良作为东北军将领，在九一八事变后，奉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命令，放弃了东北逃入关内，一直承受着内外的压力，激发了他抗日爱国的心愿，他不想成为一个千古罪人。因此，在共产党的争取、东北军将士强烈抗日的要求，全国民众一致抗日的热潮鼓舞下，张学良多次向前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苦劝抗日未果，才与杨虎城一起实行“兵谏”，迫使蒋介石抗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西安事变”。

事变的发生，着实让国内外各派政治力量吃了一惊。中国共产党也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这一事件。

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以来，白区工作已开展起来。林枫作为他的助手也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

刘少奇听到这一消息，点上一支烟，沉静地思考了一会儿，转头对林枫说：“你现在马上回去，收集各个方面的反映，我们一定要沉住气，等中央的指示。”

郭明秋本来利用一个职业掩护做地下工作，刘少奇来到天津后，认为这样太危险，指示郭明秋担任译电员的工作，负责收发中央及各方来电。刘少奇一般不亲自到林枫家看电报，但这一次例外，他亲自到林家看有没有中央来电。

“现在还没有中央来电。”郭明秋说。

“嗯……”，刘少奇长出了一口气，眉头蹙起来，点上一支烟，来回踱着步子。他在思考着：中央为什么迟迟不来电报？中央的政策是什么？北方局下一步的工作怎么开展？一连串的问题涌入脑海。

刘少奇立住脚，对林枫说：“你先把这几天收集的情况说一下。”然后，他坐下来，准备听林枫的汇报。

“噫！把那个‘将该死’（蒋介石）杀了算了！留着也没什么用，还净反共不抗日！”郭明秋心直口快，抢着说。

“恐怕没这么简单……”刘少奇看着林枫，等他说话。

“我这几日来大街小巷走遍了，一般群众、知识分子、进步的青年，还有我们的党员，一听到蒋介石被活捉的消息，都高兴坏了，都要求把他杀掉解恨。”林枫说。

“你的意见呢？”刘少奇问。

“我们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同国民党合作，但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我们党蒙受了重大损失。接下来就是打内战，蒋介石‘剿共’、‘灭共’之心不死，我们存在一天，他就不安一天。应该说，我党和蒋介石之间是敌人、死对头，不应对反动派讲情面。况且，他的国民政府在这十年里杀了多少人！血债要用血来还！落得今日下场，也是他罪有应得！”林枫激动地答。

郭明秋一看，心里想：北方局的负责人老戴该做出决定了。她急切地看着刘少奇，想得到一种满意的答案。

刘少奇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沉思了半晌，站起身来，静静地说：

“还得看看……”。

然后，他一转身，走了。

刘少奇在重大事件面前表现出来的沉稳、冷静，很为人们不理解。林枫接连几天收到一些反映情况：不少进步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都认为西安事变这么重大的事情已经发生多时，革命群众的情绪日益高涨，然而北方局却依然保持沉默，一句话也不说，这对工作